

中医文化传播的现代语境(五): 他者 之音 海外 本土中医^{*}

魏一苇^{1,2},严暄暄^{1,2**},何清湖^{1,2**}

(1. 湖南中医药大学 长沙 410208; 2. 湖南中医药文化研究基地 长沙 410208)

摘 要:在现代语境理论中,外界环境因素与内在心理因素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医药文化跨文化传播现象。尤其,海外“本土中医”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文化传播现象,它是中国传统医药文化在长期的海外传播及本土化进程中,逐渐形成的与中国中医药本体不同的、独特的中医药文化形态。海外“本土中医”作为此次研究的“他者”,是中医药文化跨文化传播中的典型变异产物,语境中的环境和心理因素影响使其表现出“去中国化”与“过中国化”两大趋势。把握语境,合理发掘和利用海外“本土中医”文化的文化传播价值将对促进中医药文化的跨文化传播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 中医文化 跨文化传播 语境 海外“本土中医” 人类学

doi:10.11842/wst.2018.01.017 中图分类号:R203 文献标识码:A

中医文化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内涵极为丰富的传播主体,尤其在海外的跨文化传播语境中,中医文化的概念和外延受语境影响仍在不断地拓展。中医文化的形态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通过与受众互动,不断地动态演变,逐渐形成了一类新的文化传播形态——海外“本土中医”。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中,常见两种文明进行比较时,研究者一方是“自我”;而研究对象一方即为“他者”,或可称为异文化者^[1]。在传统的西方学术语境中,中国文化常常被海外的人类学家们作为“他者”,而在中医跨文化传播领域里,“他者”的位置则正好颠倒过来,海外语境中的当地“本土中医”成为国内中医人类学研究的“他者”^[2]。

1 “他者”之音——海外特殊语境中的“本土中医”

“语境”或可将其称为“语言环境”“传播环境”,是

语言学、传播学和人类学等社会科学领域中普遍使用的概念和理论,指对语言和传播活动的发生与变化产生作用的环境(context)。环境一般包括客观存在的外界环境因素和传播双方的内在心理因素两方面。尤其,在中医药的海外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复杂的外界和内在环境无时无刻不深远地影响着传播形态。在海外的特殊语境中,当地“本土中医”得以应运而生。

海外“本土中医”,专指中国传统医药在长期的海外传播及在当地的本土化进程中,逐渐形成的与中国中医本体不同的、独特的“中医”形态。历史上,中医在东亚的传播所形成的后世的韩医、日本汉方,其实都可纳入“本土中医”的范畴。而在近现代,海外“本土中医”的传播主要包括两大基本发展方向:

一是基于现代医学和科学的海外“本土中医”的创新和传播,其典型代表包括美国“干针”、英国“医学针灸”等。这一类型的海外“本土中医”多以解剖、生理、

收稿日期:2018-01-01

修回日期:2018-01-20

* 中国工程院咨询研究项目(2017-ZD-06):新形势下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战略研究,负责人:张伯礼,子项目:理论发掘与人才培养,负责人:胡镜清;湖南中医药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基金(99820001-234):现代传播视野下的马王堆医学文化研究,负责人:魏一苇;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12JD57):中英两国中医形态的比较人类学研究,负责人:严暄暄。

** 通讯作者:何清湖,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医文化研究。严暄暄,女,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医药跨文化传播、中医文化人类学研究。

病理等西医文化为主导,常与现代理疗技术相结合,有的试图否认和脱离传统中医针灸经络文化^[3]。以美国“干针”为例,中医传统针灸在美国的跨文化传播中,逐渐出现了“本土化”的变异倾向。美国的一群“本土中医”逐渐不再遵循传统的中医经络理论,而改为在肌肉、筋膜等现代解剖结构的西方医学文化框架中进行演绎,并且将重点放在针灸局部的肌肉与肌腱进行物理性治疗等方面,对于中医基本理论的涉及却并不多^[4]。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传统中医与海外“本土中医”出现了较大程度的分歧,甚至出现了立法权益之争。

二是基于“东方主义”的海外“本土中医”的创新和传播,典型代表包括英国“五行针灸”、法国腊味爱学派(“甲骨文针灸”等)等。这一类型的海外“本土中医”,发挥自身对“东方”世界的想象和需求,多以甲骨文、阴阳五行、太极等中国传统文化为原型,突出对(中医的)“神”的理解和运用,在针灸基础理论、取穴、刺法等诸方面进行海外“本土式”发挥创造,并往往被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民众所认可和流传。以英国“五行针灸”文化为例,其又被称为“五行体质针灸”,20世纪60年代由沃斯利教授创建,此学派将中医圣典《黄帝内经》和《黄帝八十一难经》中有关“五行”的理论文化与哲学思想特别挑选出来,同时结合西方的现代心理学方法进行全新的中医针灸概念的建构,成为自20世纪80年代起英国影响最为广泛的本土针灸流派之一^[3]。

2 海外语境中中医跨文化传播的变异问题

海外“本土中医”是海外特殊语境中产生的“他者”之音。这个海外特殊语境,是指相对于孕育、成长中医文化的我国传统文化语境而言的,海外的异文化环境因素及异文化受众的不同认知环境。海外语境与中国文化语境差异极大。中医文化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思想,尤其受到儒释道以及周易等文化因素的影响,提倡阴阳平衡与天人合一,其体现出明显的东方语境色彩。这种东方式语境又被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霍尔称作“高语境文化”(High Context),即多用间接、含蓄、模糊的语言传播信息^[5]。例如中医将一些动摇不定的病症归为“风邪”的影响,这与西方语境中的“风”显然不是同一个概念。相对于中医所采用的“高语境文化”,在盎格鲁-欧洲文化(Anglo-European)影响下的英语国家和地区^[6],则多采用“低语境文化”,即常用更为直接、明晰的语言以传情达意^[5]。

海外“本土中医”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文化传播群

体。这些海外“本土中医”多是土生土长的外籍人士,多数没有直接接触过中国的传统中医教育,而往往是通过自己翻阅汉学著作、中医翻译书籍和本土师承等“二手”方式来习读中医,并在西方语境的影响下来理解和认识中医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这些老外在面对中医和中国文化的高语境时,采取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和应对策略,表现出海外“本土中医”传播和发展的两种趋势。

2.1 海外“本土中医”的“去中国化”趋势

一些老外试图绕过“高语境”的中医理论文化,直接运用“低语境”的西医和科学作为理论来承接针灸技术,即产生基于现代医学和科学的海外“本土中医”,表现出“去中国化”的趋势。“去中国化”主要表现在这一类型海外“本土中医”摒弃了中国传统医药基本理论和文化内涵,并不断加入西医生理、病理、解剖学以及现代技术和心理学等文化的内容,其最终形成的海外中医形态已经脱离了传统中医形态,而更多体现的是以“西医为体,中医为用”的中西结合医学文化模式。

深受西方“低语境文化”影响的海外“本土中医”人士,通常采用清晰直接的方式理解传播内容,因此从心理接受层面较难完全认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和“需要极高悟性”的中医“高语境文化”;此外,西方的整个大环境又多以建构在解剖理论基础上的西方医学思维为主,这使得海外“本土中医”为了稳固地立足于本土,而选择有意地淡化中国传统医药文化色彩,同时着重强化本土文化特质。例如美国“干针”事件就有明显的“去中国化”的文化变异问题。中国传统中医认为,美国“干针”理论的实质是来源于中国的针灸,因为其采用了中国的针灸针和针灸腧穴以治疗疾病^[7],应属中医针灸在现代发展出的一个分支。但在美国“干针”的发展过程中,研究中医针灸的美国医师们无法理解并认同中医经络理论和传统针灸穴位,而是根据西方语境将中医“穴位”改称为本土受众更容易理解的“激痛点”,并出于抢占医疗市场的利益之努力图使美国“干针”和中国传统针灸脱离,独立立法,实现“去中国化”的切割,最终使其成为符合美国本土语境的医学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同中医药跨文化传播的多维复杂性,海外“本土中医”的“去中国化”趋势其实已远远超出了单纯的文化变异讨论范畴,而是中医药乃至中国在全球的文化、科学、政治、经济、贸易以及国际话语权等领域的突出体现^[8]。作为中医药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本应该成为传播主体的“我”(中国中医药)而言,

海外“本土中医”这个“他者”显然在一定程度上反客为主,占据了传播的某些优势地位,这对于未来的全球中医药市场将存在较大的冲击作用。

2.2 海外“本土中医”的“过中国化”趋势

如果说“去中国化”是对中国传统中医文化的剔除,那么,“过中国化”则主要体现在部分海外“本土中医”将一些具有浓厚中国传统哲学文化色彩的中医药基础理论,如阴阳、五行、太极等进行夸张化的浓缩和重塑,最终形成了独特的中医药文化“西方版本”^[9],即典型的基于“东方主义”的海外“本土中医”。

这一部分海外“本土中医”基于“东方主义”,出于自身的想象和需求,热爱中国传统的“高语境文化”,认可中医传统文化魅力,但自身的西方语境文化背景又限制了他们真正理解并运用东方语境,这种复杂而特殊的冲突使得他们产生了过于夸张和神化中医药文化的行为。例如英国的“五行针灸”十分推崇中医五行哲学文化思想,强调通过判断患者的五行属性、精神状况、十四经脉的阻滞等,应用针灸方法达到祛邪、调神的目的^[10]。该针灸流派认为其是在《黄帝内经》阴阳二十五人的基础上对中医五行文化的进一步发挥,但许多国内中医界人士却持保留态度,认为这只是一种基于西方兴趣的对中医药文化和中国文化的“过中国化”解读和“自行创造”。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海外本土中医的“过中国化”趋势相较于“去中国化”,虽然在某种意义上看似有利于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但是,过度夸张的渲染与对原意的扭曲也会给中医药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削弱中医的科学形象而染上玄幻的色彩。

透视以上两种趋势,从传播学意义上来说,有其共同点,即海外“本土中医”是中医药文化形态在其他地域的本土化进程中,经由高、低语境的碰撞、抗争、融合与再创造,由海外特殊语境作用而形成的典型性变异性产物,实属“他者”之音。

3 把握语境,合理发掘和利用海外“本土中医”的文化传播价值

海外“本土中医”文化作为中国传统医药文化在长期跨文化传播及本土化整合进程中所形成的独特的中医药文化,具有特殊却复杂的文化传播价值。从有利的一方面来看,首先,海外“本土中医”文化是东、西方语境融合下的特殊产物,可以视作能够有效缓和中医药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所造成的不同文化之间冲突,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不同语境系统内部平衡的调和形态;第二,海外“本土中医”所具有的“西医为体”的文化价值思想从实践上来说,更易符合并满足本土受传者的价值需求,扩大了中医药文化在海外的影响,有其独特而有意义的跨文化传播价值;第三,海外“本土中医”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使得在对传统中医药文化的解读和重塑过程中,原来被我国本民族文化禁锢的想象力、创造力得到解放(“身在庐山中”),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对传统中医药文化的创新研究思路,有“他山之石”的借鉴作用^[9]。但另一方面,这种变异了的海外中医药文化形态在当代语境中却大多并未被传统中医学所认可,因为其实际上在某些方面确实没有遵循传统的中医药文化或是“失真”。因此,其发展和传播过程中一直伴随着巨大争议,对我国传统中医药文化的知识产权、文化传播以及行业经济利益等方面也会造成相当的消极影响。

基于此,把握海外的复杂语境,合理发掘和利用海外“本土中医”的文化传播价值将是未来工作的重要方向之一。通过开展海外“本土中医”的相关研究,能够深入东西方语境内涵,发掘其创新价值和跨文化传播价值;通过合理利用海外“本土中医”资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高、低语境文化互相理解和融合,促进中医药文化的国际跨文化传播。

(1) 重点任务:知己知彼,合作共赢

海外“本土中医”作为研究的“他者”,是一支特殊的文化传播群体,应该积极开展海外“本土中医”的相关研究,深入发掘其创新价值和跨文化价值。在总的任务上,要认识到不同语境文化对传播的影响,秉持知己知彼、合作共赢的态度和原则,加强文化交流互鉴,广泛探索新途径,合理利用海外“本土中医”资源,促进中医药文化的跨文化传播。

(2) 保障条件

在政策制度上,要设立研究专项,鼓励社会科学和中医学人员积极进入该领域,研究海外“本土中医”文化的传播谱系及现状,研究其文化创新点和创新价值,探索可能的路径对这个特殊的中医药文化传播群体加以整合和利用。在经费组成上,应主要由政府出资规划,同时鼓励院校出资进行学术交流,鼓励民间资本介入进行访问交流。在人才培养上,应建立相关学科点,培养人类学、传播学等多学科与中医交叉的复合型人才。在管理理念上,学术研究和交流访问应按一般惯例监管,对特殊情况则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为原则

进行处理。

作为一个与中国传统中医药本体不同的、形态特殊的文化传播现象,海外“本土中医”在现代语境中受到东西方“高语境文化”与“低语境文化”的碰撞、抗争、融合与再创造,正表现出走向两极、矛盾重重的“去中国

化”与“过中国化”趋势。在这样的趋势下,深刻地把握语境,加强高、低语境文化的交融,同时从不同角度合理发掘和利用海外“本土中医”的文化传播价值,既是对海外“本土中医”这个“他者”的尊重、理解和规范,更是对当代中医药传播主体“自我”的反思、发现与创新。

参考文献

- 1 严喧喧,陈小平,何清湖.“他者”眼中的“他者”——浅谈运用文化人类学研究海外中医.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2013,33(02):24-26.
- 2 严喧喧,丁颖,魏一苇,等.“他者”在“他者”的社会——英国移民中医.中医药导报,2015,21(19):1-4.
- 3 郑欣.美国当代主要针灸流派的诊疗特点及现状的研究.北京中医药大学,2012,28-35.
- 4 刘保延,魏辉,田海河,等.反对干针脱离针灸、反对绕过针灸法使用针灸(三)——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主席刘保延与美国中医论坛同仁的访谈.中医药导报,2017,23(11):4-9.
- 5 美·霍尔(Hall,E.T.)著,韩海深译.超越文化.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05.124-139.
- 6 魏一苇,何清湖,严喧喧,等.从编码解码角度探讨“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医养生国际化传播.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17,(06):994-999.
- 7 刘保延,魏辉,田海河,贺德广,樊莹,杨观虎,何崇,马寿椿,焦望义,金观源,陆飏,李永明,郑灵,黄宪生,陈业孟,仲佩莉,何红健,陈靖,王少白,黄珠英,王宁,郭宁毅.反对干针脱离针灸、反对绕过针灸法使用针灸(二)——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主席刘保延与美国中医论坛同仁的访谈.中医药导报,2017,23(10):3-7.
- 8 严喧喧,陈小平,朱民,等.“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医药跨文化传播的问题和对策——以英国为例.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17,19(06):977-983.
- 9 陈林兴,吴凯,贺霆.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医西传——兼谈国内中医药走向世界战略研究.云南中医学院学报,2014,37(01):86-90.
- 10 田同良,袁文丽,王流云,等.论五行针灸治疗精神心理疾病.中华中医药杂志,2017,32(02):516-518.

The Modern Context of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of CM (V): The Voice of the “Other”—— Overseas “Local Chinese Medicine”

Wei Yiwei^{1,2}, Yan Xuanxuan^{1,2}, He Qinghu^{1,2}

(1. Hu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Changsha, Hunan, 410208, China;

2. Hunan Research Base of TCM culture, Changsha, Hunan, 410208, China)

Abstract: In the modern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context,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internal psychological factors have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of TCM culture. In particular, the overseas “Local Chinese Medicine” is a very special cultural communication phenomenon. It is a unique cultural form which is becoming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long-term process of overseas communication and localization. In this paper, overseas “Local Chinese Medicine”, which is a typical result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of TCM culture, will be regarded as the “Other” of the research. The environmental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of the context make it show the two major trends of “De-sinicization” and “Over-sinicization”.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context, reasonable explor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he value of the overseas “Local Chinese Medicine”,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of TCM culture.

Keywords: TCM Cultur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context; Overseas “Local Chinese Medicine”; Anthropology

(责任编辑:吴 朦,责任译审:王 晶)